

以有三種目的如下：

一、經驗的：研究的目的，為組織事實。這是所謂「為學問而學問」，即以研究本身為最後的滿足，而不是以研究為達到其他目的的手段。

二、規範的：研究的目的，為達到所希冀的事物或狀態。在這裏，道德的倫理的考慮，為題中應有之義。譬如武力使用的限制、國際干涉的實施、與世界人權的保障等等，往往為研究國際關係的規範目的。

三、政策的：研究的目的，為指導政策。行為派特別強調未來的預測，

二千年來反共理論的總探討

(上)

歐陽振夏

壹 引言

共產主義之為禍於人類，雖然一直到今天，還不過是短短的五十餘年，可是如果我們真要澈底認清這一罪惡思想的根源，却不能不將我們的看法，重行回溯到二千年前的思想界中去。因為這個共產主義的思想，實際上既非創自俄國的列寧、史達林，亦非始自德國的馬克思、恩格斯，而乃是創始於二千餘年前，古代希臘的哲學家柏拉圖（Plato, 427B.C—347B.C）。

雖然，原始的共產主義思想，其目的是在廢除私有，實行公有，希望能借此造成一個公平良善的理想社會，讓一般的平民，亦能共享社會財富所帶給人類的一切利潤與福祿。可是一種過於空洞的玄想，即使其出發點，並非如聖經上所說出於「惡者的計謀」，但當它行出來時，却不見得真能與其預期的理想相襯。例如墨子的「兼愛」，其着眼點，無論從任何角度看，都可以說是一種「愛」的極至的發揮。但經聰明睿智的大思想家孟子為之一分析，却成了率獸食人的「無父」思想。同樣，共產主義這一過度天真的想法，姑不論其何以能毒化將近半個地球的人類，但它所造成的這半個地球上的空前浩劫，却可能是柏拉圖等空想家始料所不及。

爲了要徹底肅清今日共產集團所造成的一切罪行，所以我們有窮源溯流，切實廓清其禍源所在的必要；而要廓清其禍源之所在，則不能不就其二千年來國際共產思想之如何演變，及一般反共看法之是否正確，來作一客觀深

其目的即在指導政策，或影響決策者。即以美國而言，過去的青楠 George Kennan，現在的基森吉 Henry Kissinger，他們對於國際關係的研究，實或多或少地影響美國的對外政策。當然，我們在這裏提到上述兩人，並無意於把他們歸類於行為派學者裏。

因此，我們理想中的研究，必須是對於理論、行動、與方法三者之一，有所貢獻。國際關係的研究，也許毋寧不是在方法上的創制，而是如何建立理論，指導行動，以保證國際和平與國家安全，實為其第一義。

入的分析與檢討。——這，亦就是筆者之所以要寫作本文的動機所在。

貳 共產主義之歷史淵源

一、原始共產主義的產生

如前所云，共產思想，並非始自近代西方的馬克思、恩格斯，亦非始自東方的列寧、史達林；而是創始於古希臘的柏拉圖。柏氏的共產思想究竟如何？及其共產主義之原始意義究竟何在？吾人當可於其所著「共和國」或稱「理想國」(The Republic)一書中知其概略。柏氏認為：社會最高的善行是公平，而公平的原則，則是取銷私有，實行公有，並由哲學家摒除私慾，秉持公道來專政。其目的是在：使一般平民，均能共享一切財產或經濟上的利益，而其最終的目的，則是要藉此以求得國家的真正和平與統一。惟柏氏曾自認其所持之主張，只有「諸神及諸神的子孫」才能行得通。故可知原始的共產思想，只不過是一種遺世而獨立的空想。

除了柏拉圖的「共和國」以外，其他提倡共產主義比較著名的，尚有十五世紀摩爾(Sir Thomas More, 1478—1535)的「烏托邦」，及十六世紀培根(Francis Bacon 1561—1626)的「新樂土」，亦均主張實行財產共有或智識共享，以消除社會的貧困不安。惟「共產主義」一詞，則首見於一七六一年英國神學家華萊斯(Robert Wallace 1679—1771)所著的「種種

的展望」一書中。當然有關提倡共產主義的學說，以後還陸續出現過許多，但歸根來說，所有在馬克思以前的共產主義思想，均不過是因着厭惡財產私有，痛恨貧富懸殊，基於良心上的不平，而提出的一種喚起人們道德，共謀改善社會的主張。故其實質，僅為一種道德的呼喚。換言之，即為一種遺世而獨立的「天國思想」，其動機僅是一種對社會文化的抗議聲，其作用只足以激起人們「心靈的興奮」而已。

二、初期社會主義的興起

由於初期的共產主義，都是這樣空曠而不切實際，故自十九世紀開始，因着拿破崙戰爭及英國的產業革命，導致了歐洲社會的混亂不安，於是一般思想家始由空想而轉向實際，由道德的呼籲而轉為社會制度的改良，而早期社會主義的學說，亦遂因此而應運以生，其最著者如：

聖西門(C. H. D. Saint-Simon 1760—1825)的「新基督教」——主張要以「宗教的情操」，來實現「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社會主義。

傅立葉(F. M. C. Fourier 1772—1837)的「小公社」——主張人類應因「感情的吸引」，分由四百至二千人，組成各型的「公社」，以實現其「各盡所能，各取所值」的理想生活。

歌文(R. Weitling 1771—1858)的「平行四邊形新村」(Parallelogramms)，主張要在「理性的呼喚」與「人性的改造」之下，來建立一種「合作制」的組織。

蒲魯東(P. J. Proudhon 1809—1885)的「互助主義」，主張要在無政府狀態之下，建立一個自由平等的理想社會。

魏特林(W. Weitling 1808—1871)的「家族聯盟」(Familien-Bund)，主張用武力革命來奪取政權，然後由哲學家來管理政治，廢除私有，實行公有，並由「家族結構」決定社會及每個人的需要，由「勞動結構」決定滿足這些需要的方法。

以上各種社會主義的主張，雖曾為社會的改良，提供了若干理想的道路，然究其實際，則有者仍不免於空想，有者似又過於簡略，尤其是魏特林的「家族聯盟」，既可以說是柏拉圖空想的延續，亦可以說是馬克思理論的先導，而其幻想的程度，則更可以說是到了不倫不類的地步。

三、馬列共產主義的形成

因着早期的社會主義，仍是這樣空泛而不着邊際，故至十九世紀中葉，遂有倫敦的「博愛民主社」，在其發表告同志書中，首先批評社會主義是「無所不備」亦「一無所備」的東西，而認共產主義才是一種真的制度。時馬恩二氏，正不滿於當時社會主義所鼓吹的改革，而要進行激烈的革命，於是遂一面接受了「博愛民主社」的觀點，一面加入德國流亡人士在倫敦恢復活動的「正義同盟」，隨即促使改組為「共產主義同盟」，並負責起草「共產主義者宣言」，正式提出「階級鬥爭」，「無產階級革命」等主張，而譏諷社會主義為「逐漸滅亡的宗派」，和「治療社會的庸醫」，至此共產主義一詞，遂即變質而復活，而其根本意義，則為賦予原始共產主義以一種粗野的性能，以排斥一般社會主義者所鼓吹的社會改良而已。

由上述共產主義之發生及其演變經過看，即可知原始的共產主義，只不過是一種不滿於舊社會的抗議聲，充其量亦不過是一種發於良心的呼籲，聊以自慰的空想。而早期的社會主義，則為力求避免上述共產主義之空想，而欲經由實際的政治活動，以圖建立一種財富共享的理想社會。不過此時期的社會主義思想，仍不能直接認之為具體的政治主張，而只能算是一種新興的學術研究。至於馬克思之流的共產主義，則欲以殺人流血的野蠻手段，來強迫實現原始共產主義的空想，顯然已成為一種反社會主義，亦即反天理、反人性，被譏為「愚蠢中最愚蠢」(路格語)的理論。換言之，即所謂馬克思主義，或列寧主義、史達林主義，毛澤東思想，都不過是因緣於原始共產主義的思想，再加上一些最極端亦最愚蠢的暴力政策而已。羅素曾謂：「你不能從荆棘中去找葡萄，在馬克思和列寧的著作中，荆棘實比葡萄藤為多」。至於史達林與毛澤東，那就更用不着說了。

叁 國際反共看法之流變

一、對原始共產主義的反應

國際間的反共思潮，固然是在俄國革命以後，俄國的共產主義，由影響世界到為禍世界，才開始正式形成；但學術界對共產主義的批評，却早在兩

千餘年前柏拉圖的「共和國」或「理想國」問世時，即已發生。不過在柏拉圖及其以後的那一段時期中，共產主義的思想，只不過是一種徒托空言的幻想，它不但未能發為實際的行動，且在當時的思想界中，亦未能發生太大的影響力，因而人類對於它，也就無所謂擁護，無所謂反對。此為人類對於原始共產主義的一種漠不關心式的反應。（按柏拉圖式的共產主義，只曾在初期的基督教會中為使徒及教士們所局部採行，但因與神在舊約申命記中所命定的「置產」、「嗣產」、「贖產」、「分產」之旨意不相符，故始終是怨懟叢生，旋行旋止，足見敦厚如柏拉圖氏所提倡的共產思想，亦為其所攀附的「諸神及諸神的子孫」所不能容。）

二、對馬克思共產主義的態度

以後，到了馬克思時代，由於原始的共產主義，已因馬氏等為之賦予「階級鬥爭」、「無產階級革命」等野性的主張，而變質成另一形式，於是國際間才開始有了較多的討論共產思想及馬克思理論的著作，如路格、巴枯寧、蒲魯東、斯提納爾、俾斯麥、布朗格、海涅，及我國父孫中山先生等的批評，與馬氏之門徒柏因斯坦、考茨基等的修正論，都可以說是歷史上對共產思想、及馬克思主義，最正確亦最具權威的評論。但可惜當時正值產業革命以後，資本主義抬頭，人類因厭惡貧富懸殊，遂對任何有關「平均財富」的主張，都有一種盲目附和或近於偏愛的傾向，因而上述諸家的論點，對於共產思想及馬克思理論，竟未能發生如何有效的影響力。此則為一般人對於馬克思主義初起時的一種因偏愛而未加深究的昧然無所知的態度。

三、對蘇俄共產主義的看法

馬克思共產主義之錯誤，固早為當時一般先見者所熟知，但因產業革命帶來了貧富懸殊與貧困不安，故當俄國革命成功，馬克思主義被標榜及引用於此一神祕險險的國家時，一開始竟能獲得不少好學深思之士的同情，如英國的史本德和羅素，美國的萊特和費雪，義大利的西洛尼，法國的紀德，匈牙利的柯斯特勒，以及中國的陳獨秀等，均曾視共產主義為人類的希望，視蘇俄為人類的天堂，他們或傾向蘇俄，作蘇俄的同路人；或加入共黨，作各國共黨的發起者。可是當他們接觸了共產黨，尤其是接觸了蘇俄的實際以後，

他們失望了，他們灰心了，他們是由對蘇俄的失望，而產生對馬克思理論的懷疑，不過對「馬」的懷疑，終不及對「蘇」的失望。故當時一般暴露俄神蘇話及共黨罪行者，如托洛斯基的「被背叛的革命」、羅素的「布爾塞維克之理論與實際」、阿特來的「失去的夢幻」、古曾科的「鐵幕」、陳獨秀的「最後見解」、達林的「俄國奴工」，以及由柯斯特勒等六人合著的「失敗的神」，雖然一致對蘇俄共產主義的實行，均表示深惡痛絕，但其中除了羅素的馬克思理論略予涉及外，其他幾乎很少批評到馬克思理論的。

以後到了二十世紀的五十年代，馬克思的「階級鬥爭」、「無產階級革命」、「無產階級獨裁」，以及其「國際主義」、「共產主義」的罪惡，均一一由蘇俄及其附庸國家表現出來，於是才開始有人重新注意到馬克思理論的毛病。但也只是注意或研究而已，並未加以正面嚴格的批評，即使偶有批評，似亦未能探究馬克思理論的全部。且其重點，仍然是擺在列寧、史達林的頭上，而沒有注意到他們罪惡的淵藪，完全來自德國的馬克思，或甚至是來自古希臘的柏拉圖。

因而一直到今天，國際上的一般看法，仍以認為：馬克思的共產主義，並不同於柏拉圖的共產思想，而列寧、史達林以及毛澤東之流的共產制度，亦與馬克思的共產主義，迥然有別。如前南斯拉夫副總統吉拉斯，即曾在其所著「新階級」一書中說：「原始的馬克思主義，差不多已經蕩然無存了。在西方，它已經死亡，或已奄奄一息；在東方，由於共產統治權的建立，馬克思的辯證法與唯物論，不過只有一點形式主義與教條主義，還殘餘着而已」。他們似乎是將今日共產集團的一切罪惡，都歸之於列寧、史達林；而認為直接影響於他們的馬克思主義，也許尚無太大的錯誤。至於柏拉圖以來那些原始共產主義的學說，那就簡直要被奉為人類社會的主臬了。可是，像這樣一面同情共產，另一面又反對共產的看法，究竟是否完全正確呢？這在我們這些曾經身受其害的每一個人，似乎確有重加研究檢討的必要。（按：國父雖曾盛道共產主義為社會主義之上乘，並曾自稱其民生主義即為共產主義，但吾人如細讀 國父全部遺教，即可知 國父是只贊成共產理想，而非贊成共產制度；且是自有共產主義以來，反對共產制度最堅決亦最徹底的第一人。故 國父的看法，實與今日一般既同情原始共產主義又反對馬列共產主義者的看法不同。其理論詳見下節。）

肆 國際反共看法之一般

前曾說明，國際間對共產主義的批評，是早在二千餘年前柏拉圖的「共和國」問世時，即已發生。故要追溯國際間的反共看法，當自二千餘年前最早提供反共意見的亞里斯多德開始。可是如要確實清理這綿亘達二千餘年歷史的舊賬，自亦非本文所能為力，爰將國際間具有代表性的反共看法，分為「對共產主義本身的批評」及「對馬列共產主義的批評」兩大部分，來作一簡單的介紹：

一、對共產主義本身的批評

(一)亞里斯多德的批評——亞氏為柏拉圖的及門弟子，但對柏拉圖的「共和國」，批評得扼要也最中肯的，却以亞氏為第一。亞氏對「共和國」的批評，曾涉及許多的方面，惟其中最值得注意者，則為對共產主義之批評，亞氏認為：產業應歸私有，如人民道德高尚，或可達到「私有公用」之地步。他批評共產主義，是分經濟及道德兩方面：就經濟方面言，他認為私產是鼓勵人們生產的刺激物，因任何事物，越是多人所共有，就越無顧惜之心，故共產不能使社會達到最高度的生產。而就道德方面言，則私產乃人類表現道義行為所必備的工具，如寬厚與慷慨，乃為人類應有之美德，然如無任何財物以供其佈施，則此等美德，將無從表現，故私產實為表現一個人完全人格所必不可少的條件。

(二)路格 (Arnold Ruge 1802—1880) 的批評——路氏為德國赫格爾左派哲學家，原為贊成財富共享的社會主義理論家，因讀了馬克思的「共產主義者宣言」，才開始瞭解共產主義之錯誤，並認為：「共產主義是一切愚蠱中之愚蠱，頭腦簡單者所宣傳的新基督教，一旦實現，就會使人類社會退化為牧場的一種學說」。

(三)蒲魯東 (Pierre Joseph Proudhon 1809—1865) 的批評——蒲氏為法國的民主社會主義者，曾與馬克思訂交，他極端反對財產私有，但亦不贊成一般共產主義者所提倡的財產共有，他認為：「私產是強者剝削弱者，共產則弱者剝削強者」，故如認「私產為不公」，則「共產為私產的倒影，同樣是不公」。

(四)斯提納爾 (Max Stirner 1806—1856) 的批評——斯氏為德國極

端個人主義思想家、無政府主義者，初亦曾與馬、恩等交往，後因彼此意見相左而告決裂，他對共產主義的看法是：「如果我們廢除個人的所有制，那末各人都毫無所有，各人都是窮光蛋，對於唯一的司令者，最高的發令者，我們變成了平等，成了同樣的窮光蛋。……」

(五)海涅 (Heinrich Heine 1797—1856) 的批評——海氏為德國文學界「少年德意志派」的領導人，是一個被稱為「社會主義詩人」的當代最偉大的作家。他曾針對共產主義，向世人提出嚴重的預告說：「共產主義是可怖的反對主義的匿名，它不計一切後果地推翻現行的資產階級政權，建立無產階級統治，這將是一場驚心動魄的搏鬥，結局如何，除熟知未來的上帝之外，無人能知，我們所知道的僅僅是……：神正在掩面啼噓，對人類子孫之不幸，對他們長期間來的憂患，甚至對他們本身的命運，都覺不忍卒觀。」

(六)國父的批評——國父為近世以來精研共產主義與社會主義最有心得亦最有創見的第一人，他的心得是贊成共產理想但却反對共產制度，他認為共產理想決不能用共產制度來達成，而必須「另作和平完善之解決」。他的創見，就是用和平完善的方法來達成共產理想的民生主義。茲擇述其對共產主義之批評要點如次：

①他反對土地收歸國家從實均分——如云：「土地國有之法，不必要收歸國家」。又云：「吾前言平均地權，有疑為從實均地者，豈知地有貴賤，從實均分，仍有不平」。

②他反對均分富人的資財——如云：「其主張激烈，均分富人之資財者，於事理上既未能行，於主義上亦未盡合，故主張平均社會生計，必另作和平完善之解決，以達此社會主義之希望」。又云：「其主張均分富人資財，表面似合於均產之旨，實則一時之均，而非永久之均也」。

③他更不贊成一般所謂「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共產制度——如云：「共產主義本為社會主義之上乘；然今日一般國民道德之程度，未能達到極端（按國民道德達到極端，是永不可能的事實，吾人須深體 國父此言之隱意），盡其所能，以求所需者尚居少數；任取所需，而未嘗稍盡所能者，隨在皆是。於是盡所能者，其所盡未必充分之能；而取所需者，其所取恐又為過量之需矣。狡猾誠實之不同，其勤惰苦樂亦因之不同。其與真正之社會主義，反相抵觸」。